

鲁迅与郁达夫

唐 达 晖

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,离合聚散,有各种不同的情况。有的原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,后来由于各自思想的变迁,而疏远或绝交了。反之,有的虽“曾用笔墨相识,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”^①,并不纠缠于个人恩怨。当然,也不乏始终如一的知交和战友。这中间错综复杂的经历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和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。

鲁迅与郁达夫从二十年代相识以后,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郁达夫是一个情况较为复杂的作家,人们对他的评价不一。有人说他是“英勇的战士”^②,而更多的人把他看作颓废派。他自己也不以战士自居,曾说:“从前和鲁迅一道在上海的时候,我曾对史特莱女士说过一句话‘I am not a fighter, but only a writer’。”^③虽然如此,当我们考察他的一生时,仍有理由认为,郁达夫是新文学史上一位才华卓越的作家,同时也是一位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的战士。诚然,郁达夫的生活道路是坎坷曲折的,他没有能象鲁迅或其他先进人物那样,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,然而他一生反抗黑暗,追求正义,坚持“五四”反帝反封建精神,在民族民主革命中,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“时穷节乃见,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,不能见松柏之坚贞,自是确语。”^④这是抗战艰苦阶段,郁达夫论及文人操守时说的话。而他自己,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,最后是把生命献给了祖国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。

鲁迅是深知郁达夫的。“和鲁迅一道在上海的时候”,也正是郁达夫生活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。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,也是郁达夫诞辰八十五周年。缅怀新文学史上这两位先驱者的友谊,我们仍能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。

一

郁达夫生于一八九六年,晚于鲁迅十五年。他们早年都曾留学日本,都是在异邦眼看到“故国的陆沉”,身受到“异乡的屈辱”^⑤,转而从文学运动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,鲁迅以他的《狂人日记》等小说,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石;郁达夫也于一九二一年,以新文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沈沦》使文坛瞩目。他们早已是新文学阵营里的战友,但他们的认识,却是在一九二三年。

郁达夫与鲁迅相识之前,与周作人有一段关系。原来《沈沦》出版后,引起极大纷争。郁达夫后来谈及此事说:“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,所受的讥评嘲骂,也不知有几十百次。后来周作人先生,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,一般骂我海淫、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,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。”^⑥对此,郁达夫是怀有感激之情的。

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(正月初二),周作人邀郁达夫和其他几位友人到北京八道湾寓所午餐。其时鲁迅和周作人还住在一起,

因而得以和郁达夫见面，这是他们交往的开始。郁达夫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^⑦，这次来京小住，与鲁迅见过两次。这年秋天，郁达夫到北京大学任讲师，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这段时间，他们相会较多。一九二五年初，郁达夫又离开北京去武昌师范大学任教授。此后，据鲁迅日记，一九二五年十月和一九二六年七月，他们在北京还有过两次见面。

郁达夫是前期创造社的中坚分子。在文学观点上，鲁迅与他“是不能一致的”^⑧。但他们还是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。郁达夫后来在《回忆鲁迅》中记述了和鲁迅相识的情景，亲切地描述了鲁迅的音容笑貌。鲁迅“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，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”的精神，日常生活、工作中朴实严谨的作风，都给他以深刻的印象。尤其令他感动的，是鲁迅热情关怀青年，“对于后进的提拔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”。他们曾经议议，从各种刊物上，选些新人的作品，編集出版，“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，得着些安慰，而努力去创作”^⑨。虽然由于人事变迁，这个合作计划未能实现，但由此已可见他们在提携青年方面，是志同道合的。

鲁迅是这样谈到自己的印象：“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，谈过好几回，只觉他稳健和平”^⑩；“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”^⑪。的确，在创造社中，和鲁迅结识最早，而且一直保持着深切友谊的，只有郁达夫。有的同志说，一见到郁达夫，就感到创造社中，他与别人不同：“他是那样与你亲切和顺，平易幽雅。从中使我感到，怪不得鲁迅先生与他相处的那样好”^⑫。郁达夫的真率谦和，无疑是博得鲁迅好感的原因，但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，更为重要的，还是因为他们是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。

在北京，鲁迅与郁达夫交往还不密切。他们的合作共事，携手战斗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在上海的日子里。大革命失

败前后，他们曾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和感受。

一九二六年三月，郁达夫与郭沫若同赴广州，到广东大学（后改名中山大学）任教。当时，革命已潜伏着严重危机，蒋介石正在逐步篡夺革命领导权，并伺机最后叛变革命。郁达夫本是满腔热情投奔革命，不料“所见到的，又只是些阴谋诡计，卑鄙污浊。一种幻想，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，不待半年，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”^⑬。他把自己的感受，告诉在厦门并准备来中大的鲁迅。因此鲁迅给许广平信中，就提到郁达夫“似于中大颇不满”^⑭，“信上确有愤言”^⑮。

郁达夫终于辞去中大职务，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下旬回到上海。鲁迅则于次年一月到达广州。鲁迅到广州后，很快就发现，“革命策源地”的广州，也可以变成“反革命策源地”。中大情形，“非常曲折，真是一言难尽”^⑯。他与郁达夫一样有幻灭之感：“我抱着梦幻而来，一遇实际，便被从梦境放逐了，不过剩下些索漠。”^⑰他们都从现实的“离奇”中，察觉到隐伏的危机，及时发出警告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，鲁迅写了《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》，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胜利，而忘却进击。郁达夫回上海后，也撰文指出，现时的革命，“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”，应当努力“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”^⑱；要人们警惕个人独裁的新军阀，“继承旧日的军阀，而再来压迫民众”^⑲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们各自写了一系列文章，揭露和谴责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，屠戮群众的罪行。当郁达夫受到广州反动刊物《这样做》的攻击时，鲁迅在《扣丝杂感》、《怎么写》两文中，及时揭露了这个刊物反共反革命的丑恶嘴脸，支持了郁达夫。

郁达夫到上海后的一系列言论，一方面招致反动分子的攻击，一方面也导致他和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分歧。特别是他回上海不久，就发表《广州事情》，揭露广东方面的黑暗，指出所谓国民政府，实际已为少数野心分子所操纵。当时还在北伐队伍中的郭沫若、成

仿吾，则认为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，发表这样的文章，“易为反动派所利用”^②，因而加以指责。此外，郁达夫回沪，本是受托整顿创造社出版部，但他的作法，却为同人所不满。接着，因创造社受到反动当局压迫，郁达夫又被同伴责以“空言招祸，于实际毫无补益”^③。分歧日益加剧，最后郁达夫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登报声明退出创造社。

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，鲁迅来到上海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后期战斗十年，在“围剿”和反“围剿”的斗争中，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。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三天，就在李小峰为他洗尘的宴会上，会见了郁达夫。从此，他们或见面，或通信，交往频繁，在互相支持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，建立了亲密、深厚的战斗友谊。

从大革命失败前后，郁达夫发表的言论来看，立场鲜明，态度激进，不能说他消极动摇。不过，革命的挫败，使他感到“中国人心的死灭，革命事业的难成”^④，加上和创造社旧友的决裂，益发使他对于将来，对于国家，“都抱一种悲感的深愁”^⑤，思想情绪陷于矛盾苦闷之中。这种苦闷，有时代的特色，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愤懑、失望和看不清前途。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，郁达夫更需要事业上、政治上有力的支持和鼓励，因此他见到鲁迅时感到高兴。与鲁迅的重逢，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，有重要的意义。事实上，上海时期，郁达夫的许多重要活动，都与鲁迅有密切关系。郭沫若曾说：“郁达夫之于鲁迅，更有点近于崇拜了”^⑥。的确，鲁迅伟大的思想和人格，对郁达夫是有吸引力的。

当然，影响和支持总是相互的。鲁迅怀着投入新的战斗的愿望来到上海，本想与创造社联合的，不料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，却遭到围攻。“鲁迅先生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”^⑦。有些人不了解鲁迅，甚至一个从广州来投奔他的学生，见他受攻击，也负义地离

他而去了。郁达夫这时和鲁迅携起手来，说明他对鲁迅有较深的认识。

一九二八年，创造社在文学战线上重整旗鼓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，是适应了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，诚如后来鲁迅所说，“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”^⑧，功不可没。这一运动，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前奏。瞿秋白回顾革命文学论争时指出：“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，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，而开始形成起来”^⑨。由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大多是转变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世界观还没有得到真正改造，加上受到当时国内和国际“左”的错误倾向的影响，因而他们虽然力图把文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，实际上却“很有些错误之处的”^⑩。他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和当前的形势，缺乏正确的了解，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都当成了革命对象，而且首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鲁迅，引起了一场论战。

在革命文学的论战中，鲁迅充分表现了作为“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”的精神，他批评了创造社、太阳社的一些错误主张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。大革命失败后，鲁迅的世界观，已经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，而革命文学的论战，又促使他进一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使他的思想向新的高度发展。

脱离了创造社的郁达夫，也被革命文学倡导者认为是应当批判的。而郁达夫对于无产阶级文学，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他并不反对无产阶级文学，相反，他早就说过，“无产阶级的文学，当然是存在的”，批评那些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人，是“受足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熏育”^⑪。但是在认定“中国的将来，是无产阶级的，中国的文学，也是无产阶级的”^⑫的时候，他又强调，“无产阶级的文学，非要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不可”^⑬；“在无产阶级专

政的时期未达到以先，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不会发生的”^②，这就无异于否定了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学运动。这是不对的。不过，即使在这里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合理因素。如他说，“不是无产阶级者，而只教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，不管你有几千万家财，有几十乘汽车，有几十间高大洋楼，只教你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心，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无产阶级者的这一种理论，我是绝对否认的。”^③这如鲁迅所说“也不相信住洋房，喝咖啡，却道‘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，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’的革命文学者”^④一样，对于那种轻视世界观的改造，似乎转眼之间就可以改变立场的观点，是一种针砭。郁达夫还反对脱离生活，没有真情实感和艺术力量的概念化的作品，这也和鲁迅对当时革命文学者的某些批评是相近的。

郁达夫认为创造社、太阳社围攻鲁迅，是错误的。当《文化批判》创刊号攻击鲁迅、叶圣陶，又说郁达夫“对于社会的态度”与他们一样时，郁达夫就公开说明了自己与创造社的关系和对鲁迅的看法，说：“对他的人格，我是素来知道的，对他的作品，我也有一定的见解。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，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，我从前是这样想，现在也这样想，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。”^⑤还批驳了有人散布的关于鲁迅的流言。

差不多同时，他又在《语丝》发表了杂文《革命广告》^⑥。这是由于《申报》刊登了一篇“广告式文字”，说在上海发现了一家咖啡馆，在那里可以遇见文艺界的名人鲁迅、郁达夫等。据说这家咖啡馆是创造社开的。郁达夫写道：“我想老人鲁迅，总也不会革命咖啡馆里进出，去喝革命咖啡的，因为‘老’，就是不革命，就是反革命。”又说：“不晓得这咖啡究竟是第几阶级的咖啡？更不晓得豪奢放逸的咖啡馆这东西，究竟是‘颓废派’呢，或是普列塔，或者是恶伏黑变。至于我这一个不革

命的小资产阶级郁达夫呢，身上老在苦没‘有’许多的零用钱，‘有’的只是‘有闲’，‘有闲’，失业的‘有闲’，乃至第几千几X的‘有闲’，所以近来对于奢华费钱的咖啡馆，绝迹不敢进去。”这些讽刺的语言，是针对创造社平时攻击鲁迅的言论，反唇相讥。这篇短文后面，还有一篇《鲁迅附记》。这也表明他们当时的观点态度有许多一致的地方。一九三三年，郁达夫赠鲁迅一首诗：“醉眼朦胧上酒楼，彷徨呐喊两悠悠。群盲竭尽蚍蜉力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批评了某些人对鲁迅的错误看法，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。早就有人这样评价郁达夫：“他确不是一个浪漫，颓废的人。富于热情的他，在根源上还是有着冷静的识力的。……有两桩事实给我认识他的纯洁与直率：第一是在广东正闹着北伐的那个时候，他便似乎看到了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两手空空，孑然一身的跑回上海来了；第二是创造社与语丝社争闹的时候，他便与鲁迅提携起来，仿佛他是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了鲁迅。”^⑦

鲁迅到上海不久，即接任复刊后的《语丝》主编，过去没有在《语丝》上发表过作品的郁达夫，从复刊第一期起，就为它写稿。一九二八年六月，他们又合作创办《奔流》。刊物主要是介绍外国优秀作家和作品。特别要提到的，是一至五期连载了鲁迅翻译的《苏俄的文艺政策》，这里概述了二十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激烈论争的情况，对我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很有借鉴意义。从这开始，鲁迅有计划地译介无产阶级文艺理论。还要提到，郁达夫在鲁迅鼓励下，翻译了高尔基的《托尔斯泰回忆杂记》和《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》。不过后者到一九三一年才译出，其时《奔流》已停刊，译文发表在别的刊物上，后又收入译文集《几个伟大的作家》。他在《译者序引》中说明了翻译经过：当初他没有在《奔流》把《一封信》译成，“后来经一位朋友全部译出，发表在另一月刊的上面。随后他又出

了一部书”，正当“喜欢着有人代我做成了这未竟之功。但不幸得很，拿了中译本来和英译本一对，觉得有许多地方还不十分妥当。而尤其是大家觉得不幸的，是这一位朋友，在那一本书出版之后，竟殉了主义，已经不存在世上了。所以这一回，当整理旧稿之际，我又重新把这一部稿子翻译了一到。”这一位朋友，指的是柔石。在编《奔流》期间，鲁迅已患肺病，仍不辞辛劳地工作，除写作外，所有校对、集稿、算发稿费等事务，均由他担负，加上北新书局拖欠稿费，到后来使刊物不能按期出版，更增添了许多麻烦。郁达夫在《回忆鲁迅》中，谈到《奔流》的事，对鲁迅的“实际干材”和苦干精神，表示十分钦佩。一九三二年，黎烈文接编《自由谈》，郁达夫向鲁迅说：“我们一定要维持他，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，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，就是新文学的胜利。”^③鲁迅给予了大力支持。郁达夫自己和茅盾、瞿秋白等革命作家，都在《自由谈》发表不少杂文，为革命文艺开辟了一个阵地。这些事例说明，在发展进步文学事业的共同目标下，鲁迅与郁达夫是密切合作的。

二

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，是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分歧问题，后来双方都团结在左联这一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中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真正敌对者，是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。最先向革命文学进攻的是“新月派”。一九二七年末，鲁迅就和“新月派”的梁实秋交锋了。鲁迅写了《卢梭和胃口》、《文学和出汗》，驳斥梁实秋的资产阶级观点。郁达夫配合鲁迅，在一九二八年初写了《卢骚传》、《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》、《翻译说明就算答辩》。他明确指出是针对梁实秋写的：“因为听见朋友说，有一位教授在讲台上说卢骚‘一无足取’。……心里实在有点不服”^④。由于梁实

秋的攻击卢梭，是以白璧德的意见为依据的，于是鲁迅和郁达夫，都用辛克莱的《拜金艺术》一书来批判白璧德。鲁迅在《卢梭和胃口》中所引辛克莱的原文有这样一句话：“阿疑夫人曰：‘最后的一句，好象是对于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。’”郁达夫在《翻译说明就算答辩》中引用了辛克莱的话以后，说道：“梁先生若容许我效一效阿疑夫人的颞，那么我只想说一句，‘这一章好象是对于梁教授的一箭似的’。”梁实秋认为用辛克莱的话攻击白璧德是“借刀杀人”。鲁迅于是又写了一篇《头》，揭露梁实秋攻击卢梭，是用“借头示众”的手法攻击进步作家。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，梁实秋还悻悻地说：“我在新月上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，但是也没有忘记抨击浪漫的颓废的倾向。……郁达夫原是属于浪漫颓废一类型，但是很奇怪的他在北新半月刊里连载翻译辛克莱的《拜金艺术》，为左派推波助澜！”^⑤看来当时的一箭是射着他的痛处的。

正如冯雪峰所说：“一九三〇年二月间参加了‘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’，三月间参加并领导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’的成立，这样，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候，鲁迅先生就不仅把思想态度，而且把他站在共产党方面的鲜明的政治态度，也宣告于世了。”^⑥而在这个时候，郁达夫和鲁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参加了鲁迅领导和支持的各种革命团体，也就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站在革命一边。

鲁迅到上海不久，就同中国济难会有了联系，以后曾多次捐款救助受难者。郁达夫也曾和阿英一起编辑济难会的刊物《白华》。一九三〇年二月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，宣言上署名的五十一位发起人中，郁达夫列第一，鲁迅列第二。同年三月，左联成立，在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中，就有郁达夫的名字。一九三三年一月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，鲁迅和郁达夫都被选为分会执委。

这里要说一说郁达夫与左联的关系。郁达夫作为左联发起人，是鲁迅提名的。据夏衍回忆：“当时鲁迅指着发起人名单，说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人，为啥不参加？冯乃超回答，他当时很消沉。鲁迅说：郁达夫还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作家，应该作为发起人之一。我和冯都同意了。”^②这就说明，鲁迅一开始就反对关门主义倾向，主张左联团结更广泛的进步作家。他一贯认为那种“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，都十分正确，分明，这才是真的革命军”^③的形而上学观点，是于革命有害的。他十分了解郁达夫，既知道他的弱点，更看到他进步的主导方面。原创造社成员王独清，曾对此大肆攻击。他在托派刊物《展开》上发表文章，谩骂郁达夫，并攻击“反对鲁迅郁达夫的人现在又去自动地同鲁迅郁达夫联合”，是“走上了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”，“是自己混乱了战线”^④。与郁达夫有宿怨又已堕落为托派的王独清，蓄意诬蔑中伤，是不足怪的。他站在托派立场，攻击左联的路线，这倒从反面证明了，原创造社、太阳社成员和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，是正确的。

关于郁达夫后来是否退出了左联，说法不一。据有的老同志回忆，“并无退出之事”^⑤。但郁达夫在《回忆鲁迅》（续篇）中曾说，左联成立后不久，他就向左联“宣布了辞职”。又据一九三三年郁达夫迁居杭州不久，一位访问者的文章所记，郁达夫说过：“在左翼作家联盟中，最近我已经自动的把‘郁达夫’这个名字除掉了。”^⑥而冯雪峰在谈到“左联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，不讲策略，不会团结人”时，曾举例说：“郁达夫参加左联，是鲁迅介绍的，他参加后不大积极，写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。文总开会决定开除郁达夫。我不赞成，于是投票表决。结果只有我、柔石等四票反对，其他人都赞成。事后我对鲁迅讲了，他也不同意文总的决定，认为人手多一个好一个。后来文委书记朱镜

我知道此事，不同意文总的做法，批评了有关的几个人。”^⑦又据他的回忆，朱镜我担任文委书记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到年底，那么，可知他说的这件事，是发生在一九三〇年。因此他提到的郁达夫给左联的信，有可能就是郁达夫自己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向左联宣布“辞职”。由于这些回忆材料互有出入，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。鲁迅的态度是一贯的，还是要多团结人。他既不会同意“开除”，当然也不会赞成郁达夫自己“退出”。

应当指出的是，郁达夫之所以不愿留在左联，决非反对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，而是不满于左联的某些做法，例如不注意斗争策略，要盟员上街发传单、写标语、搞飞行集会等。这些“左”的做法，影响了左联争取团结更多的进步作家共同战斗，对于生性较为散漫不惯于组织约束的郁达夫来说，是更难接受的。他明白地说出了要退出左联的原因：“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，要去做实际工作，是很不容易，倘若勉强的被逼了去，反而只会贻害了大众”^⑧。又说：“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，我对于我自己，认识得很清，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，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”^⑨。他之所以说自己只是作家，而不是战士，大概也有不能做这种“实际工作”的意思。有人借此说郁达夫走的是和左翼相反的道路，或说他是厌恶政治，“死抱住文学不放”的人，都是曲解。事实上，郁达夫并不是不关心政治，也没有与左联背道而驰。他自己就说：“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，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，也着实不少。”^⑩下面谈到的郁达夫参加的一系列政治斗争，更足以证明他和鲁迅、和左联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。

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，文化界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，郁达夫“出席的出席，介绍的介绍”^⑪，热情很高。他的住所，成了不少文化人的临时避难所。鲁迅的家陷入火线，郁达夫十分担心，“探问了三天，终于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楼上，找着了鲁迅全家”^⑫。鲁迅、

郁达夫等四十三人，联名发表了《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》^⑤，呼吁世界革命人民和作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，“保护中国的革命”。一九三二年七月，郁达夫、柳亚子等三十二位作家，联名致电南京当局，要求释放被捕的牛兰夫妇^⑥。同年十二月，鲁迅、郁达夫等五十八人联名发表《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》^⑦。一九三三年二月，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，鲁迅即去电吊唁^⑧，郁达夫写了《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》^⑨。随后，鲁迅、郁达夫等九位作家发表《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》^⑩。一九三三年五月，丁玲、潘梓年被捕，民权保障同盟及文艺界人士三十八人致电南京有关当局，要求释放，郁达夫参加签名。

一位作家，除了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之外，主要是用笔来战斗。鲁迅后期最重要的武器是杂文。杂文的出现，是现实斗争的需要。郁达夫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杂文，称道它“简练得象一把匕首，能以寸铁杀人，一刀见血”^⑪。在鲁迅的影响下，杂文的“作者多起来，读者也多起来了”^⑫。郁达夫也是一位战斗杂文的作者。当人们谈到郁达夫的作品时，往往忽略了他的杂文，这样是不能很好了解他的“全人”的。鲁迅杂文，是大家熟知的。这里着重介绍一下郁达夫的杂文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除了前面提到的《广州事情》等政论文外，郁达夫还写了一些文章，继续揭露蒋介石反革命集团。如一九二八年发表在《白华》上的《故事》，借古喻今，用秦始皇的故事，影射蒋家王朝的暴虐。一九三〇年的《薇蕨集序》^⑬，是对法西斯暴政的愤怒控诉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，叫嚷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疯狂镇压革命。鲁迅写了《战略关系》、《中国人的生命圈》、《文章与题目》等一系列杂文予以揭露。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，日军占领山海关。次日，郁达夫写《山海关》，用讽刺笔法揭露日寇侵略野心

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：“山海关是河北临榆县之所辖，系属于中国本部十八省的地域，日本人是宽宏量大，对中国决没有领土的野心的——这是日本人的宣言——可是中国人却比日本人更是宽宏量大，对自己的领土，更没有野心，所以日本人大约也是迫不得已，只好进关来替中国人来代行管理管理。”在《改昔人咏长城诗》中，有“可怜一月初三夜，白送他人作战壕”的悲愤语。《一文一武的教训》抨击蒋介石只顾打内战，在侵略者面前，“一让几千几万里”，“对外国人真客气，对自己的老百姓真太不客气”。《声东击西》则揭露：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的侵占，明明是在东北，而中国大军的去向，却偏不朝着这一方面走”。这种“声东击西”的战略，原来是专门“用在对内”的。

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，也不准人民抗日，声称“诉诸国联”，要等外国人来解决。郁达夫揭露这种“以夷制夷”的政策，“正和吃了砒霜药老虎的计策一样”，是一条死路（《自力与他力》）。鲁迅揭露更深刻：反动派倒是想“以夷制华”，引进帝国主义兵力，来反共反人民（《“以夷制夷”》）。

为了掩盖其法西斯专政，国民党又玩弄所谓制宪运动的花招，于一九三三年一月，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，扬言“还政于民”。郁达夫在《政权和民权》中，揭穿这一骗局道：“预备立宪——这四字在满清光绪年间也曾哄动过一时”，不是什么新花样了。“政权既要开放，何以民权却偏要那么的封闭”？《炉边独语》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，更甚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。也就在反动派玩弄“立宪”花招的时候，一九三三年一月，镇江《江声报》记者刘煜生被杀害了。民权保障同盟为此发表抗议宣言。郁达夫写了《非法与非非法》，斥责国民党反动派蹂躏人权，卖国投降，反诬民权保障同盟为“非法团体”的可耻行径。这一时期，鲁迅的《“光明所到……”》等文，也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暗无天日。

鲁迅在《伪自由书·前记》等文，刻画了三十年代文坛叭儿狗的丑恶嘴脸。郁达夫也揭露这些无耻文人如何帮助主子“处置叛逆”，“更会借了光明正大的招牌，公然的来通风报信，说：‘某某就是某某的化名，住在什么地方。’”（《说木铎少年》）。

所有这一切，都表明郁达夫与鲁迅不仅斗争方向一致，而且配合紧密；也证明鲁迅对郁达夫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。

三

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击反革命“围剿”的斗争中，鲁迅与郁达夫结成真挚的战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差异。就政治思想立场来说，鲁迅这时已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；郁达夫在大革命前后，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，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。郁达夫有热情，有才能，多理想，但缺乏鲁迅那种坚定性和韧性，有时“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，便萌退志”^②。他对自己的散漫习性，常感不满，多次表示决心振作，但又不能彻底改变积习。他待人真挚，重情感，但有时识人不深。如他对林语堂、周作人有好感，就把鲁迅同他们关系的恶化，当成是双方的误解。他想为鲁迅和林语堂作和事老，却不知道他们的破裂，根源在于政治道路上的原则分歧，而非出于私怨。正是这些思想性格上的弱点，影响了郁达夫在这一时期的更坚决的斗争。

郁达夫以革命作家身份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，不能不引起反动派的忌恨。一九三〇年他写道：“三四年来，不晓为了什么，总觉得不能安居乐业，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。”^③自由大同盟一成立，他和鲁迅就受到压迫。左联五烈士遇难，鲁迅又被迫离家暂避，郁达夫也“接到了警告，就仓皇离去了寓居。”^④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深入，压迫也愈演愈烈。“文禁如毛，缇骑遍

地”^⑤，革命作家生命毫无保障，作品难以发表。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，一九三二年春，郁达夫取龚自珍诗，自书一联：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，悬挂书斋，以舒愤懑^⑥。论者每以此事作为郁达夫消极逃避的标志。然而，从实际情况看，这时他并没有脱离战斗，相反，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，倒是他参加政治活动最多和写杂文最勤的时期。当然，这里确实也流露出了他内心的矛盾。在这期间，他也写了《东梓关》、《迟桂花》、《碧浪潮的秋夜》等有消极情调的小说。《瓢儿和尚》中“我”有一段自述：“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成功以后，国共分家，于是……近朱者，便都是乱党，不白的，自然也尽成了叛逆，不管你怎么样勤苦的老百姓，只须加上你以莫须有的三字罪名，就可以夷你到十七八族之远。我当时所享受的那种被迫上身来的悠闲清福，来源也就在这里了，理由是因为我所参加的一个文学团体的杂志上，时常要议论国事，毁谤朝廷。”可见那悠闲清福的背后，其实隐伏着对黑暗现实的义愤；而“访古探幽”，则是一种 camouflage（伪装，掩饰）。这些话，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白。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作者神往于朴实幽闲的乡村生活，追求一种纯净自然的精神境界，这些“理想”当然是消极和脱离现实的，但它又是一个憎恶现实的黑暗污秽，而又不能同群众斗争相结合，看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之所寄托，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。鲁迅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些小说，他曾把《迟桂花》推荐给《草鞋脚》的编者伊罗生^⑦，就能说明这一点。

一九三三年四月，郁达夫终因感到“在上海滩上，不能生存，迁到杭州来住了”^⑧。移家的原因，他谈得甚多：“洋场米贵，狭巷人多”^⑨；“游子思乡，飞鸿倦旅”^⑩。生活上的压力，固然是一个因素，但更深刻的原因，还是在于政治环境。“伤乱久嫌文学狱，偷安新学武陵渔”^⑪，道出了对白色恐怖充满愤慨

而又无能为力的消极情绪。另外，左翼内部的分歧和文艺界的矛盾，也是使他情绪消沉的因素。

郁达夫离沪不久，事变就连续发生。五月，丁玲、潘梓年被捕（一度传闻丁已被害），应修人拒捕牺牲；六月，杨杏佛遭暗杀。反动派企图瓦解左翼，趁机造谣。《社会新闻》捏造《左翼作家纷纷离沪》消息，涉及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等。对这类毁谤性的流言，郁达夫感到气愤，曾作《无题》一首并加小序曰：“自来故里，因夏日之可畏，所以不敢出头而露面，海上蚊章（小报之西译名），误传此意，谓某某之逃归，全系慑于丁死杨亡之结果，对镜抚背，我真有曳尾泥中之感矣，缀成四十字，聊代万言书：背脊驼如此，牢骚发渐幽，避嫌逃故里，装病过新秋，未老权当老，言愁始欲愁，看他经国者，叱咤几时休。”②

鲁迅以无产阶级战士大无畏精神，痛斥无耻文氓的谰言：“杨杏佛一死，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。……否则，一群流氓，几枝手枪，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。”③他说，“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，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”，所以他决心“更非住在上海不可，并且写文章骂他们，还要出版，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”④。郁达夫的离沪，固然不是由于“丁死杨亡”，但客观上毕竟削弱了左翼一分力量，而且于他自己也不利，鲁迅当然是不赞同的。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他的处境和鲁迅的不同。抗战时期郁达夫在南洋，为当地一些文艺青年误解时，一位国内作家就指出：“达夫先生和鲁迅先生茅盾先生是不同的类型，我们不能以期望鲁迅茅盾先生者期望他。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，他的强烈的正义感，他的为大众喉舌，革命友人的事业，依然要给他以很高的评价”⑤。鲁迅完全理解郁达夫的性格和处境，对他的动向深表关注，为他的离开斗争漩涡而深感惋惜。在郁达夫离开上海半年多之后的一九三三年除夕，还特地写给他一首诗，语重心长地劝他不要指望在杭州

找到政治避风港，并给他指出一条正确道路：“何似举家游旷远，风波浩荡足行吟。”⑥可惜郁达夫没有听从鲁迅的劝告，终于在杭州定居下来，结果如他在《回忆鲁迅》中所说：“被一位党部的先生，弄得家破人亡”。

其实，就是不遇到这位“党部先生”，郁达夫也决学不成“武陵渔”。他一到杭州，就已发现“朝市而今虽不是秦，但杭州一偶，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，……‘烽火满天殍满地，儒生何处可逃秦？’”⑦可见“乱世桃源非乐土”⑧的认识，也不是后来才有的。只是他一方面不满于现实，一方面又心灰意冷，因循苟安。自来杭州之后，前一时期那种富有战斗气息的杂文大为减少了，而代之以山水游记和他称之为“闲书”的小品。但人毕竟不能真正离开现实，何况郁达夫这样敏感而又有所追求的人。他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。那些游记小品，未必真的那么悠闲超脱，特别是有些诗作，是常常透露出一种伤时感世的情怀的。所以钱杏邨认为，郁达夫的散文，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，在动乱时代的苦闷，“即使是记游文罢，如果不是从文字的浮面来了解作者的话，我感到他的愤闷也是透露在字里行间的。他说出游并非‘写忧’，而‘忧’实际上是存在的。超出景物的描写，人事的叙述之外，来了解作者，在这个时代是有着必要。”⑨

郁达夫到杭州后，仍和鲁迅保持着经常联系，每到上海，无论如何总要抽出时间去找鲁迅谈谈，“光是为了鲁迅之故，而跑上海的事情，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”⑩。一九三四年，《太白》在鲁迅支持下创刊。这个刊物提倡战斗的杂文，抵制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的“闲适”、“幽默”小品。鲁迅特地写信告诉郁达夫，刊物推定他为编辑委员⑪。这里也体现出鲁迅的关怀，希望他拿起战斗的笔。

一九三六年二月，郁达夫去福建，就再没有同鲁迅见面的机会了。十月十九日，鲁迅逝世。郁达夫闻讯，立即奔回上海参加葬

仪。并作《怀鲁迅》，说：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有了伟大的人物，而不知拥护，爱戴，崇仰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语极深刻。抗战前期，又作《回忆鲁迅》说：“鲁迅的葬事，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，他的葬仪，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暴日的一种示威运动。”是的，鲁迅唤起了“民族魂”。鲁迅去世不到一年，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。郁达夫热情宣传抗日救亡。一九三八年底，他到新加坡担任《星洲日报》副刊编辑。在此期间，虽遭家庭变故的打击，而他并未因此消沉，一直坚定不移地从事抗日活动，写作极为勤奋。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，他详细讲述了鲁迅生平业绩，称颂鲁迅“对恶势力，死不妥协，韧性战斗精神，至足为我辈学习。其对青年，极能提掖，虽然数度上当，亦不气馁。至临终时，尚在执笔为文”。郁达夫也很关怀青年，培养了不少当地文艺新人。他为马华文学所作的贡献，至今犹为人们所称道。为了促进文艺界团结抗日，他主张“艺术上的宽容”，认为除汉奸文艺外，团结得越广泛越好，反对“以宗派观念来扰乱大局”^②。皖南事变后，郁达夫领衔发表《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》，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和迫害进步人士，呼吁“坚持国共合作，反对妥协投降”。新加坡陷落后，他逃亡苏门答腊，化名隐蔽。“赘秦原不为身谋，揽辔犹思定十洲”^③。在与虎狼周旋的险恶屈辱的环境中，念念不忘救国。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，郁达夫惨遭日本宪兵杀害。鲁迅早年身在异国，曾有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誓愿；作为鲁迅战友的郁达夫，为苦难的祖国，在异邦的土地上，用鲜血写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页。

① 《且介亭杂文末篇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。

② 钱杏邨《〈达夫代表作〉后序》，素雅编《郁达夫评传》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初版。

③ 《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》，《郁达夫资料补篇（下）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出版。

④ 《“文人”》，温梓川编《郁达夫南游记》香港世界出版社。

⑤ 《忏余集·忏余独白》。

⑥⑬⑳ 《鸡肋集·题辞》。

⑦ 郁达夫《回忆鲁迅》说第一次和鲁迅见面是在他入北大教书的那年冬天，地点在砖塔胡同，实误。

⑧⑪ 《伪自由书·前记》。

⑨ 《奇零集·给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者》。

⑩ 《三闲集·怎么写》。

⑫ 臧云远《云集大武汉》，《南艺学报》1979年第二期。

⑭⑮ 《两地书》九八、一〇一。

⑯ 《致章廷谦》（1927.2.25）。

⑰ 《三闲集·在钟楼上》。

⑱ 《广州事情》，《洪水》第三卷第25期。

⑲ 《奇零集·在方向转换的途中》。

⑳ 成仿吾《读了〈广州事情〉》，《洪水》第三卷第28期。

㉑㉒ 郁达夫《翻译说明就算答辩》，《北新》第二卷第8号。

㉓ 《日记九种·厌炎日记》（1927.7.31）。

㉔ 《一封信的问题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十三卷。

㉕ 冯雪峰《回忆鲁迅·我怎样去见鲁迅先生》。

㉖㉗ 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。

㉘ 瞿秋白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。

㉙ 《奇零集·〈鸭绿江上〉读后感》。

㉚ 《奇零集·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》。

㉛ 《过去集·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》。

㉜ 《奇零集·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》。

㉝㉞ 《对于社会的态度》，《北新》第二卷第19号。

㉟ 《三闲集·文学的阶级性》。

㊱ 《语丝》第四卷第33期。《鲁迅附记》即后来收入《三闲集》的《革命咖啡店》。

㊲ 匡亚明《郁达夫印象记》，素雅编《郁达夫评传》。

㊳㊴ 郁达夫《回忆鲁迅》。

- ④⑩ 梁实秋《忆“新月”》(1963)。
- ④⑪ 冯雪峰《回忆鲁迅·鲁迅先生对左联的态度》。
- ④⑫ 《与夏衍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》，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五辑。
- ④⑬ 《二心集·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》。
- ④⑭ 王独清《创造社——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》，黄人影编《创造社论》光华书局1932年12月版。
- ④⑮ 郁风《三叔达夫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0年第一期。
- ④⑯⑰ 许雪雪《郁达夫先生访问记》，邹啸编《郁达夫论》北新书局1933年7月初版。
- ④⑱ 《冯雪峰谈左联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0年第一期。
- ④⑲⑳ 郁达夫《回忆鲁迅》(续篇)。
- ⑤① 《忏余集·沪战中的生活》。
- ⑤② 《一二八的当时》，《郁达夫资料补篇(下)》。
- ⑤③ 《文艺新闻》战时特刊《烽火》第2号。
- ⑤④ 《现代》第一卷第4期。
- ⑤⑤ 《文学月报》第一卷第5、6期合刊。
- ⑤⑥ 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二辑。
- ⑤⑦ 《现代》第三卷第1期。
- ⑤⑧ 《文学杂志》第2号，又见《文艺月报》创刊号。
- ⑤⑨ 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〉导言》。
- ⑥⑩ 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。
- ⑥⑪ 《薇蕨集》出版时，这篇序被抽掉，后收入《断残集》。
- ⑥⑫ 《论郁达夫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十二卷。
- ⑥⑬ 《薇蕨集序》。
- ⑥⑭ 《忏余集·钓台的春昼》。
- ⑥⑮ 《致台静农》(1932.8.15)。
- ⑥⑯ 见《现代》第二卷第1期。
- ⑥⑰ 见《鲁迅茅盾选编〈草鞋脚〉的有关资料》，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六辑。
- ⑥⑱ 《达夫散文集·追怀洪雪帆先生》。
- ⑥⑲⑳ 《断残集·移家琐记》。
- ⑦⑩ 《闲书·住所的话》。
- ⑦⑪ 《迁杭有感》。
- ⑦⑫ 《论语》第25期。
- ⑦⑬ 《伪自由书·后记》。
- ⑦⑭ 《致山本初枝》(1934.7.11.)。
- ⑦⑮ 适夷《遥寄星洲》，《郁达夫资料补篇(下)》。
- ⑦⑯ 《集外集·阻郁达夫移家杭州》。
- ⑦⑰ 《离乱杂诗(九)》。
- ⑦⑱ 阿英《现代十六家小品·郁达夫小品序》，光明书局1935年3月初版。
- ⑧① 《致郁达夫》(1934.9.10)。
- ⑧② 《艺术上的宽容》，《郁达夫资料补篇(下)》。
- ⑧③ 《无题四首》。

(上接第79页)但在情节结构方面则显得比较松散。长诗主人公恰尔德·哈洛尔德只是在外表上与情节的发展有些联系而已。诗中有些场面相互间的联系也显得极其薄弱。

总之，长诗《恰尔德·哈洛尔德游记》

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一部优秀的浪漫主义的诗作，奏出了拜伦时代人民的心声，起到了鼓舞人民，推动历史的积极作用。遗憾的是诗人无力再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，改造社会的明确纲领。